# 1 中国抗日战争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争取外援的努力

## 1.1 中国抗日战争所处的国际环境

以 1937 年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国全民族抗战处在一个十分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遭到世界各国人们的一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华战争损害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加深了日本同西方国家的矛盾。但是由于 1935 和 1936 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局势异常紧张。意大利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佛朗哥叛军进攻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民主政府，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且利用国联的软弱和英、法,特别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吞并了捷克。因而英法忙于对付德国和意大利，对日本的侵华战争采取了绥靖政策。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但在国际事务中因其经济实力雄厚而举足轻重。其时，为避免卷入军事冲突，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在政府和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因而在相当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了“不干涉政策”。由于经济的利益,美国还向日本大量输出军用物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希望在东西方边界有一个缓和的形势。中国的抗战遏制了日本在东方的侵略野心，有利于苏联东部边界的稳定，因而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有力的援助。德意日虽然签署了反共协定，但是各有自己的打算，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软弱的国际联盟尽管为英法几个大国操纵，在制止侵略中不能起多大的实际作用，但也还是一个申诉和争取国际同情的讲坛。

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面对上述的国际环境，中国有四种力量可以争取：一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和平外交政策的苏联。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是中国抗战的基本同盟者。三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它们尽管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为着自身利益有可能牺牲弱国的利益，有时还可能以弱国的利益作砝码同侵略者作交易，但当它们面对日本独占中国的现实，它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从全世界侵略和反侵略力量的格局出发时，给中国以实际援助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种援助虽然带有相当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和一定的投机性，然而它们是国家的当权者，较之这些国家人民的援助要巨大得多，对中国的抗战起着重要作用。四是德、意和日本虽是同盟，但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由于历史原因，

德国和意大利在军事上都曾是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者，它们在中国派有军事顾问，售给中国军事装备，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因此，在抗战初期，中国也曾得到德、意的军事“援助”。这种“援助”既有贸易利益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军事顾问中对援华持积极态度的个人因素的作用。当然，这种“援助”不同于前三种力量，是敌人内部矛盾的一种利用。

应该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民主国家政府，以及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不是单方面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遏制了日本北进的企图，延缓了日本南进的计划。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使苏联无两面作战的顾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美国和英国的太平洋战场也是有力的支援。因此，那种认为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只是单方面的，中国只是被援助者的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那种低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也是片面和错误的。

在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对内坚持“剿共”，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退让，以求屈辱的“和平”。其时，中国既未动员全面抗战，国际社会也就止于对中国的道义声援，而无实际的援助。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一面继续向国际联盟申诉，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一面多方寻求援助。

## 1.2 中国政府寻求国际援助的努力

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寻求国际援助的努力大体有以下几

个方面：

1. 向国际联盟申诉，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援助中国。1937 年 7 月 16 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即向 1921 年 12 月在华盛顿签订“九国公约”的签字国① 递送了备忘录，谴责日本破坏公约。1937 年 9 月 12 日，即国际联盟十八届常务会开会的前一日，以顾维钧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向国联秘书长正式递送了申诉书，要求国联运用会章第十、十一条和第十七条规定，明确中日战争责任所在；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实行对日的适当制裁 。15 日，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国联成员国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此后，中国代表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和国联大会，以及布鲁塞尔九国公约国会议上多次提出制裁日本侵略的要求，并在会下进行了各种活动。

2. 派官方和私人代表到苏联和欧、美活动。 1937 年 9 月，中国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以及张冲、王叔铭、王世杰一行四人携军事技术人员赴苏联，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说明日本侵华经过，争取援助。 1938 年 1 月、7 月和 1939 年 4 月先后三次派立法院长孙科赴苏联，同时赴英、法活动。 1943 年和 1944 年，宋美龄和孔祥熙也曾访问美国，宋美龄还去加拿大，进行争取外援的活动。宋子文则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驻在美国，同美国商谈并筹措美援问题。

3. 蒋介石亲自活动，争取援助。1937 年 7 月 21 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 25 日，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知东亚局势，希望英、美政府以坚决态度制止日本侵略。 1938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给予经济、物质

①原签字国为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日本、比利时、中国，后来补签国为玻利维亚、瑞典、挪威、丹麦、墨西哥。

援助。蒋介石还多次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磋商苏援问题。

4. 加强国际宣传。为了使国际社会了解日本侵华及其暴行真相，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加强和改进了对国际的宣传工作。国民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国际宣传处（前身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下的第五部），该处在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设立了支部。以后扩大为驻香港、上海、伦敦、纽约等 4 个办事处。香港、上海沦陷后在仰光和新加坡增设了办事处，承担香港、上海的部分联络工作。国际宣传处印发的宣传刊物有英文的《战时中国（China at War）》月刊和半月刊、日刊各一种，在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尔本、蒙特利尔刊行日刊一种，在伦敦、加尔各答刊行周刊一种，在悉尼刊行日刊一种。国际宣传处还办有世界语的《东方呼声》月刊。此处还刊行过《重庆新闻（ChongqingReporter）》、法文的《中国通信》月刊、英文的《远东镜》月刊、《现代中国》月刊等。该处还设立了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以 XRVG 呼号，以英、法、德、日等国语言向国际广播。该处的重要科室和驻外机构多由同情中国抗战的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职员，如美国人范毕宇、法兰、柏兰德，英国人《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上海麦仑书院校长夏普麟，法国神甫杨安然，比利时神甫柏立德，原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武道，原牛津大学汉学家马彬和，日本反战人士、著名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和绿川英子等都曾任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的播音员。① 1942 年 1 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英、美、荷等各国驻中国使馆派代表组成的“反侵略国联合宣传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同盟国间的宣传工作。

①武燕军：《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民国档案》1990 年第 2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于阶级的偏见，国民党政府始终将争取外援的工作重点放在美英等国。但是在抗战初期，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虽在道义上表示谴责日本，在实际行动上却没有给中国以多少援助，这就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争取援助的工作重点转向苏联。因此在 1940 年以前，中国抗战所得到的外援主要来自苏联，1940 年以后，特别是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情况才发生变化，美援逐步增加，苏援日益减少。

## 1.3 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争取尽可能的外援，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1937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发表的第二次宣言中就明确提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8 月 15 日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指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并特别指出要“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要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此后，中共中央及其主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个主张。中共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凯丰就如何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的问题曾在《华美周刊》上发表文章，就加强国际宣传问题提出建议：一，组织国际宣传的机关；二，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对外的宣传；三，组织共同代表

团去欧美 四,摄制中国抗战电影,出版中国抗战画报、照片,以及各种书籍。,,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包括以下要点:(1)坚持自力更生，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但不依赖外援；(2)区分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可靠的直接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同盟军，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则是不可靠的间接的同盟军;(3)区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统治者和人民，后者是可靠的同盟者;(4)在不同的战争阶段采取不同的联合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国发动对波兰进攻之前，这是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西班牙反对佛朗哥叛军的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战争不具有世界的全局性，其性质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第二阶段是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以后至 1941年 6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时止。英、法等国卷入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双方都不具有正义性。认为中国不应站在战争双方的任何一方，应该努力变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同时对于可能利用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应尽量利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应欢迎。第三阶段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因社会主义苏联的加入而改变了它的性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应该联合同盟国家，加入同盟国阵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轴心国阵营。中国共产党尽管对于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分析有些偏颇，即忽视了对

①凯丰：《怎样争取抗战胜利》。《华美周刊》第 1卷第 34 期，1938 年 12 月 10 日。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具体分析，完全否认了德国进攻波兰的侵略性质，否认了这一阶段法西斯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的区别。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区别的分析，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在援助中国抗战中的阶级偏见和利己主义的出发点所保持的高度警惕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种认识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即使在支持共产国际的观点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中国有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就在欧战爆发不久，重庆《新华日报》即发表评论说："我们正在进行抗战,我们的外交路线,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这是确实不移的原则。'我们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① 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它不是从概念而是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实际对外政策。到 1940 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即已转变。这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明确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 1.4 争取外援的两种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当政的国民党都主张争取外

① 《新华日报》社论：《国际形势与我国抗战》，1939 年 9 月 7 日。

援，但是方针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争取外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① “我们的抗战，自然并不只依靠外援，而主要的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要竭力争取外援，使我们减少牺牲，加速战胜敌人。”②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这样主张，而且为争取外援做了大量工作。1938 年 2 月 11 日，在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在伦敦召开援华制日世界大会的前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次会配合伦敦大会，进行了世界反侵略运动的宣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组织了国际宣传科，负责对外宣传的工作。1939 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了英文的《中国通讯》，至 1940 年共出刊 16 期。1940 年夏，又设国际宣传委员会，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印行了对外宣传的月刊《中国报告》。这份刊物共出了 10 余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印刷材料困难而停刊。马海德、巴苏华都曾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③ 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强了对日军俘虏的工作，在延安举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日军俘虏经过教育之后，在延安、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日本人民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开展对敌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的医务人员到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并争取了部分医药物资。这些活动和成绩，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外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将争取外援置于自力更生的基

①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② 《新华日报》社论：《开展国民外交争取国际援助》，1939 年 11 月 19 日。

③《中共党史通讯》第 100 期，1993 年 2 月 25 日。

础上，而不是依赖外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和封锁，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官方援助，就是各国民间的援助，也是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才得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装备，绝大部分来自敌伪军的缴获。为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自力更生，其源泉来自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民主政治，使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充满朝气。人民军队愈战愈强，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后期，就连开明的美国外交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国民党争取外援则是另一种方针。他表面上也主张“自强自立”“自力更生”；至于求得友邦的援助，这固然是我们抗战外交应努力的目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回抗战的一个根本一贯的精神，就是我们要独立抗战，自力更生，决不存有任何依赖之想。尤其要知道我们国家原来是处在次殖民地的地位，我们要革命建国，要实行主义，格外不好存一种什么依赖友邦的心思，而且世界各国，莫不为他自己的利益打算，我们也不能以友邦的援助与否，动摇我们的根本的国策。否则如果以为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援助，就可以抗战，得不到友邦的援助，就不能抗战，这不仅是失了常识，而且根本不能革命！”① 蒋介石口头上是这样说，实际上却是没有外援就准备“拆伙”，准备失败。1944 年 9 月 22 日，史迪威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对于进行战争没有要做更进一步努力的企图。任何人请他采取这种行动，都要被他排斥。……蒋介石相信，他只要用那故技，说假如美国不

①《蒋总统集》第 1 册，台北“国防”研究院印行。

支持他，他就拆伙，他就能继续向美国榨取金钱和武器。他相信太平洋上的战争，几乎就要结束，而采用拖延的伎俩，他就能将全部负担放在我们身上。”① 1944 年初，蒋介石要求美国给予 10 亿美元的援助，否则，或者美国自己负担其在华军队的一切费用（而美元对法币的比例则以 1 比 20 计算，而当时黑市的比价是 1 比 120），或者就由美国负责向中国平民提供粮食。如果这些建议美国都不同意，“那么，中国将被迫采取唯一可能的途径，那就是，以它一切所有的力量继续抵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直至它不能抵抗时为止，这样中国亦总算尽了联合国一员的责任。在那种情形下，中国对于它的战时财政经济只得听其自然。’② 蒋介石这封信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如果美国不给援助，中国的抗战就不可能到底，中国就会垮台。这里，自强自立没有了,自力更生也不见了。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新华日报》曾予以批评“:有人以为中国抗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友邦,友邦不援助中国，中国就不必抗战；又有人以为中国抗战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友邦的援助，友邦不援助中国，中国就不能抗战。因而拿不抗战来威胁友邦，拿不能抗战来乞怜友邦，要友邦加强对于中国的援助。这实在是对于全中华民族的一大侮辱!’③ （新华日报》的这一批评实际上就是针对蒋介石的。蒋介石之所以不可能真正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由他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所决定的。他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对于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采取限制和压迫的政策，“以大约三十万左右政府最好的军队固着不

① 《史迪威将军的报告》 1944 年 9 月 22 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

② （蒋介石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 1944 年 1 月 16 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

③（新华日报》社论:《对美国加强援助之认识》 1943 年 3 月 11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以监视中国共产党。’① 而不是放在抗日前线。在中国，坚持‘ 自力更生 ”,第一要讲团结,团结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而不是对民主力量进行限制和压迫；第二要讲民主，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充分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第三要改革,去掉一切腐败陋习，使内政外交都有新的建树。否则，“ 自力更生 ”就是一句空话。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治上日益腐败，军事上不断溃败就是很好的证明。

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处于十分困难条件下的中国抗战是极其可贵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五亿人口和广袤土地的大国来说，是不可能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援助解决问题的，它主要靠自己的奋斗。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主要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美国借给中国的最大的一笔五亿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绝大部分用于购买黄金，稳定法币，而且其中的二亿六千万美元在 1944 年 10 月以后才拨出 ②。美国在以租借法案名义下援助中国的物资，至 1944 年 6 月 30 日,总值为 15358.4 万美元，只占美国在这一时期全部租借物资总值 2844148.1 万美元的 0.54%。计划通过史迪威日后转运的物资总值为 22700 万美元，如果加上这部分，其比例也不过仅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总值的 1.3% 。而这一期间，美援英的租借物资总值达 932159.9 万美元，援助苏联的租借物资总值为 593194.4 万美元,分别占美援外租借物资总值的 32.8% 和 20.9% 。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尽管有国际援助，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实际上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下来的 ③。外援应该尽可能争取，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和牺

①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

② 《1942 年的五亿美元财政援助以及其他战时财政关系》，《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

③ 《新华日报》1944 年 8 月 24 日。

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速我们的胜利。但自力更生是争取外援的前提和基础，这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证明。

## 1.5 活跃的国民外交

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即以半官方或民间的形式争取外援的活动异常活跃。国民外交协会是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主要机构。中国劳动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以及中国佛教会、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在争取外援的工作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由宋庆龄等发起和领导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争取外援的工作中作用特别突出。这个组织不仅进行一般的宣传和呼吁，而且为争取外援，又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外援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38 年 2 月建立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派驻了代表，组织了驻外常务代表团，向欧美民间援华组织提供中国抗战形势的宣传材料，联络援华人士，为推动援华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39 年 4 月，它的下属组织妇女工作委员会发起国民外交义卖运动，发动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制作刺绣品和玩具寄往国外义卖。中国的劳工团体、学生组织和宗教团体或是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劳工、农民、学生组织召集的会议，或是派团出访，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对华援助。1938 年 6 月，1939 年 9 月，1941 年 10 月，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利用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机

会呼吁各国劳工组织援华抗日。于 1936 年 7 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 1937 年和 1938 年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周游亚、非、欧美 28 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国民外交工作，宣传抗日争取援助。 1939 年 9 月出席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后赴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等地，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 1937 年 10 月下旬，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赴马来亚为组织僧侣救护队筹集捐款。1939 年 10 月，以太虚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从重庆出发赴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等国访问,历时 7 个月。访问团在印度受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尼赫鲁等领导人的欢迎，在印度发起组织了复兴佛迹国际委员会，在锡兰促进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和中锡文化协会的建立。中国佛教界还曾筹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泰国、缅甸、印度、锡兰等国,争取国际佛教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1939 年 12 月至 1941 年 1 月,由马天英为团长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访问了马来亚，在马来亚各地讲演 500 余次，进行争取国际援助的宣传。它促进了中马文化协会的成立，组织了新加坡回教援华募药会，募得援华款 10 万元国币。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在七七事变后遍访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1940 年 12 月 29 日在重庆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联系了许多印度、朝鲜、缅甸、日本、越南的反战人士。进行国民外交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政治信仰各异，宗教信仰不同，但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下，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目标，进行着争取国际援助的共同工作。他们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官方所难以取代的。

# 2 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 2.1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国际联盟是一个由几个大国操纵和影响，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于 1919 年 4 月诞生的。但是，美国国会否决了加入国联的提案，因此倡议创建国联的美国，却一直没有加入国联。由于美国是一个大国和强国，国联的每一个行动没有它的支持就难以实行。它虽身在国联之外，却制约着国联的活动。国联全体大会每年一次，大会闭会期间，由行政院履行职权，其总部设在日内瓦。

国际联盟对于中国遭受侵略表示了同情，但态度极为软弱，离中国向国联申诉的要求相差甚远。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

府即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组织了五人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团长是英国的李顿爵士（Lord Lytton）；团员有美国的麦考益少将(Major－General Frank R. Mocoy)、法国的克劳德中将(Lieutenant-General Henri Claudel)、德国的希尼博士（Dr. Heinrich Schnee）和意大利的阿尔特洛万第伯爵（Count Alcrovandi－Marescotti)。调查团于 1932 年 2 月 29 日到东京，3 月 14 日到上海，随后赴南京、汉口、北平。4 月 21 日到沈阳 5 月 3 日在长春访问了溥仪，在东北工作了七个星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调查团于 1932 年 9 月向国联提交了一份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的基调是调解中日冲突，回避对日本侵略的谴责，说东北事件“既非此国对于彼国不先利用国际联合会盟约所定和解之机会而遽行宣战之事件，亦非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① 报告书虽然言词闪烁，不肯明确地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不称日本为侵略国或违背宪章国，并提出有利于日本的原则意见，诸如应考虑中日双方甚至苏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提出东北地方政府自治等建议。但是，在很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实际上指出了日本发动事变的非正义性。第一个问题，这份报告书肯定了“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布独立，事实具在”，指出日本的这种行动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② 和华盛顿九国公约。第二个问题，表示了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认为承认“满洲国”“与现存国际义务之基本原则不合，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

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第九章，见《顾维钧回忆录》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②正式名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1928 年 8 月 27 日签订于巴黎。该条约的发起人为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故又称《白里安一凯洛格条约》。至 1933 年，加入者有 63 个国家。

之愿望”。这份报告书提交国联行政院后，由于它不承认“满洲国”而为日本所坚决反对；而对于报告书的第九、十两章解决中日争端的建议部分，中国政府则认为过于迁就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应加修改。1932 年 11 月 21 日至 28 日国联行政院第 69 届会议开会，不顾日本的反对，决定将李顿报告书提交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讨论。许多小国支持中国的申诉。捷克代表贝纳斯(Eduard Benes)在 1932 年 12 月召开的国联特别大会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明确支持中国，谴责日本，并责备国联对日本侵略采取忍让态度，就是鼓励日本的侵略。捷克、爱尔兰、西班牙和瑞士四国在会上提出谴责日本和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提案，但未获通过。12 月 9 日，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决定将李顿报告书和捷克等四国提案一并交付为解决中日争端于 1932 年 3 月建立的十九国委员会讨论，起草建议。1933 年 2 月 14 日，十九国委员会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基础通过了关于解决中日冲突的建议书草案。建议书强调了解决中日争端“须遵守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之规定”，声明‘凡用违反联合会盟约或巴黎公约之手段所缔造之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联合会会员均不予承认”。建议书提出满洲自治，但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从而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这一建议书于 1933 年 2 月 24 日为国联大会特别会议通过。只有日本投了反对票，并当场退席。暹罗弃权。就在这次会上，还决定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成员除原来的十九国委员会成员外，加上了加拿大和荷兰。美国和苏联也被邀请参加。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随时观察远东形势，协助大会主席工作。一个月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书遭到日本的反对，说明了尽管建议书表现得十分软弱，没有明确指出日本的行动是光天化日下的侵略行径，也未明确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但是它还是没有使日本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